

社会学评论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SHEHUIXUE
PINGLUN
(第一辑)

社会学评论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SHEHUIXUE
PINGLUN
(第一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学评论(第一辑)/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216 - 06069 - 1

I. 社…

II. 华…

III. 社会学—年刊

IV. C91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8480 号

社会学评论(第一辑)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318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7.25
插页:1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069 - 1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雷 洪

执行主编 吴 毅

编 辑 郑丹丹、澜清、狄金华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建定 石人炳 孙秋云 吴中宇 吴 毅 陈志霞

贺雪峰 董磊明 雷 洪

卷 首 语

当历史进入公元 2009 年的门槛时,《社会学评论》面世了,这是一个期许已久而又孕育已久的新生命,它承载着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人为学术发展添砖加瓦,极尽绵薄之力的使命,也表达了我们力图为学界提供一个展示、沟通与交流平台的愿望。

中国作为一个超大的转型国家,其所面临社会问题的复杂与深广,乃前所不遇,这既给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又给它带来机遇。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同仁之担当;切磋与交流这些问题,吾辈之幸运。故特办此连续学术出版物。然地居华中,无地缘与学缘优势,如何在百舸争流的思想激流中寻求方位,实乃《社会学评论》所要面对的问题。如一朵生长于华中沃土、吮吸四海精华的小花,我们惟愿它能在广大同仁的呵护与浇灌下不断成长。有此,沟通中外与海纳百川便是它应该养成的胸怀,面向社会与服务现实亦是其不避之责任,而融理论、方法与问题研究于一炉以及追求学科的交叉互补,则是其应该追求的特色。

《社会学评论》是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年刊,作为主编,我还期盼它能追求厚重扎实的学问品格,宏扬规范严谨的的学术作风,同时更努力营造华中社会学的学术特色,以为我研究精进与人才辈出奉献力量。

愿与诸位编辑同仁为此而不懈努力。

主 编

目 录

过·往·的·再·思

- 反思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 佟 新/1
- 下乡给年轻人带来了好处吗？
——对中国“文革”期间城乡人口流动的社会后果的再评价
..... 谢宇 姜洋 绿人/26

转·型·的·透·视

- 松绑后的台湾乡建发展：政府化、商品化或以农民为本
..... 钟秀梅/48
- 从艾滋病问题看中国的政治社会变动 阿古智子/63
- 结构变动期的党政精英与区域社会
——基于在四川省 SH 县进行的问卷调查
..... 南裕子 中冈まり/82
- 从“囚徒困境”到“智猪博弈”
——资本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供给中作用的实证研究
..... 杨雅如 刘焱/103

向·下·的·关·注

- 草样的年华：南中国打工白领的生存境遇
——以一个山乡青年打工白领群体为例 毕文俊/118
- 后单位社会“新失业群体”职业适应困境形成机制分析
..... 赵定东/153

以可行能力剥夺看待农民工生存行动 胡 兵/184

事 · 件 · 的 · 凝 · 视

“假”的生产及其逻辑

——对“华南虎事件”的分析 张 斌/218

他们与我们

——《他们的 9 · 11》带给我们的启示 潘家恩/253

稿 · 约

反思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

佟 新**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一家跨国公司订单企业民主选举工会代表过程的考察,回顾已有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将工人参与到全球化生产的经验和相关的人权话语视为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基础。

关键词:新工人阶级 阶级意识 参与政治 表述政治

一、新工人阶级的产生

研究表明,现当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正在产生着新工人阶级。这一新工人阶级的产生与全球化下资本积累的新模式相关,也与全球化下人权话语相关。本文通过对某跨国公司的订单企业选举工会代表和工会主席的考察,反思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考察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参与政治和表述政治的重要性。

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讨论是近年来社会学关注的话题(lee,1997;潘毅,2005;沈原,2006;佟新等,2008)。本文毫不怀疑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而是力求进一步讨论中国新工人阶级作为结构力量如何被唤醒。所谓的“新工人阶级”不完全是指农民工,而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全球垄断资本的运作过程中,并与其发生特定的劳动关系的工人们。所谓比较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是将历史和比较的视角纳入对中国“新工人阶级”的理解上,特别是通过对英法和韩国等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社会条件分析,以理解中国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可能性,特别是工人对全球化生产的参与、受剥削的经验和以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性话语在其中的作用。

*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资助”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劳动关系研究”(05JJD840143)成果之一。

**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这些思考源于2002年至2005年我们对一家锐步公司(Reebok,跨国公司,以生产运动产品为主)的订单企业——胜达公司的调查。这家企业在跨国公司的要求下在2002年实现了民主选举工会代表的活动。在这一选举过程中,各种新式话语出现在打工妹的口中,如“人权”、“人权大佬”(对客户派来的监督负责人的称呼)、“生产守则”、“供应商”等等。这是在中国传统的工业权威中不曾有过的声音,它不再是等级制的,也不再是家长式权威;既有对加班和工资的不满,也有对团结的渴望。

为了更好地了解工人选举工会代表的情况,2002年8月,我们组织了课题组专门到胜达公司进行调查。从2002年8月至2005年11月,我们三次到胜达公司进行调研工作。课题组的一些成员亲自观察了工人选举工会代表的过程,还访问了地方工会组织和发改委等部门。调查过程中,我们共计访谈52人次以上,获得访谈资料和相关文献资料60多万字。^{〔1〕}

胜达公司位于福州市的投资区。这个投资区是1990年8月创建的民办投资区,由当地村里、镇里集资,以及贷款办法兴建的,属于省级投资区。该投资区占地55平方公里,本地常驻人口5万多,其中农业人口3万8千人。而外来人口近10万人,远远超过了本地人口数量。从1990年该投资区兴建到2001年,该区共引进外资7亿美元,307个项目,其中175个外资项目,132个国内项目。在307个项目中建成投产的有242个,其中外资企业146个,包括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台湾、澳门、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以我国台湾地区企业数为多。在已建成的146个外资企业中,有107个企业已经建立了工会组织,占外资企业的73.3%。

胜达公司是一家典型的转包工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都是台湾人。它接受跨国公司——锐步公司的订单,锐步公司在胜达公司设有办事处。作为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工厂,2002年初,胜达公司有职工约12000多人。这些工人以外来工为主,来自全国各地;女工占80%左右。在2002年时,胜达公司的平均月工资已经达到700—800元(2002年福州市的最低工资是380元),在当地属于高工资。按照Reebok的要求,工人工时是每周58小时。但是据我们了解,工人实际工作时间远远超过58小时。工人一般是早上8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如果晚上加班或者连班,公司都付加班费。正常加班是每周四个晚上,一晚上3个小时,周六工作8小时,共60小时。一般加班时间是从晚上6

〔1〕 本研究也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支持,该企业是福特基金会支持的“企业民主和公司治理”调研课题实施调研企业之一。参加这一企业调查的人员有:陈佩华、朱庆华、佟新、戴建中、冯同庆、龙彦、马丹、李文芬、梁萌等。

点到9点,这是正常加班。有时为了“赶货”(按订单要求限时完成产品生产)会超出上述加班时间。

调查时,公司称已经给每一位工人上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这些保险都是按照国家的硬性要求从1999年1月开始投保的。但据我们调查,这些投保并没有覆盖全部工人,投保人数占全厂总人数的50%—60%,2001年的投保人数为6300人,2002年是5800人。保费由工厂缴工资总额的20%,工人缴6%。

为什么胜达厂会在2002年进行一次工会直选呢?答案是简单的,即是跨国公司的要求。锐步公司在胜达公司派驻了人权代表,设立了劳动条件监察信箱,严格要求企业实施每周最多58小时的工作时间安排等。正值胜达公司第一届工会主席任期届满,在考虑到“工人自由结社,增加集体谈判”的全球协议的要求,锐步公司决定在胜达厂工会主席换届时,推行全体工人直接选举工会代表的行动,后来,锐步公司还在广东的一家企业试行了这样的选举活动。2006年的第三届工会选举依然是直选。

这一选举活动得到了上级工会部门的同意。但省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对此有诸多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有些领导对跨国公司督促直选工会代表感到困惑,甚至有些人觉得这是跨国资本在干涉中国政治。此外,该台资企业的领导层并不情愿建立工会。但是正是通过工人参与选举,工人们以合法和合理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利益诉求,一种新型的结构性力量得以显现。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工人如何获得阶级意识?是经验还是话语对阶级意识的形成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现当代怎样的话语可能成为新工人阶级形成的动员工具?

二、研究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范式

1963年,E. P. 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发表标志着新劳工史学时代的到来,从此工人阶级形成的动力学说不断被创造出来,并形成了重要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本文将通过对英法和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考察,思考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点。历史社会学强调从时间和空间视角思考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对特定场景下的社会结构给予解释,着重于有意义的行动和结构背景的互动作用。历史社会学突出用特殊类型的社会结构与变迁模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解释社会与文化的差异,并研究社会结构与变迁的特定进程(斯考切波,2007,第2—3页)。

考察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纵观一些重要的研究,其基本的思路是沿着卡尔·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形成要经历一个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理论模式。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的重点推动力是阶级意识的产生。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意识与物质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工人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不仅要有工人对自身阶级历史作用的理解,还要有对整体社会进程的理解。卢卡奇指出,阶级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无产阶级的历史意义的合理性表达;阶级意识不是超验的,而是阶级的历史发展和现实实践的产物。当然卢卡奇还看到了“虚假”的阶级意识(卢卡奇,1992)。

如何形成阶级意识呢?至少有两个基本的理论,一个是无产阶级化理论。它强调是工人们经历了被剥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过将其经验与某种解释相结合而形成工人阶级意识,并产生了工人阶级。另一个是话语建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无产阶级化的理论遇到质疑,因为阶级冲突似乎销声匿迹,政治文化研究获得了学术空间,文化的特殊作用得以强调,话语分析提到了学术前沿,指出以权力为基础的话语和叙述把工人定义为一个群体,并建构了工人群体的各种经验。但这两种研究范式的共同点都在于对文化的强调,后又发展出将两者进行综合的理论。

(一)无产阶级化与阶级意识的模型

考察工人阶级的形成需要历史观,因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普遍现象。大凡经历过工业化的国家都经历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并由不同途径形成了工人阶级。

“从大约1750年到大约1850年的100年时间里,英国经济经历了一种以竞争为特征的演变过程,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工业革命,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劳动力队伍从其传统结构方向向现代工业劳动阶级的转变。作为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变革,这些演变为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活动舞台。因此可以说,这一演变过程赋予社会新的特征,其中包括新阶级与新的阶级关系的产生。”(波斯坦,2002,114)

在对大不列颠在1750年到大约1850年的100年时间里的劳动力状况的分析中看到,市场环境对于劳动者一方不利,他们的工资几乎保持或接近于贫困生存线的水平。劳动力队伍的无产阶级化演变出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阶级关系(波斯坦,2002,115)。从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韩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研究,历史社会学揭示了一个资

本残酷剥削工人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历史的普遍性。然而,什么时候人们会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获得团结的政治意识,并采取集体行动争取一个阶级的利益呢?即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会在怎样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依然是个问题。

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进行了长时段的考察。在他看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需要时间的。通过汤普森的研究我们看到了现代工厂如何造就了一代工人的劳动、情感、纪律和观念。从1790年代或更早,英国的农民、工匠开始了其“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英国的工人分为农业工人、城市手工工匠和手工织工,他们在工业化过程中不断被纳入到现代性的生产。同时,童工、长时间工作和低工资是普遍事实。在汤普森的眼中,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人的生活水平问题,而是工人们的情感,他们的价值观念以及他们有关“公正”、“独立”、“安全保障”的观念及其面临的危险。

汤普森指出,剥削关系是非个人化的,当市场对有经验和有技术的劳动得到需要时,出现了新的家长制。如家长式的服从义务、服从“行业”利益的义务和宗教的义务等。宗教在此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作用于工业化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纪律,生产了新的社会控制;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工人自助组织的产生。在新的社会控制中,底层工人被视为懒惰的、需要被控制的;同时,工人在与雇主的对立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凝聚力。不可忽视的是,19世纪初,工人们开始学习文化,摆脱文盲的状况。在酒馆中,有人大声地阅读报纸,无论是潘恩的自由思想,还是欧文的激进政治都潜移默化地在日常生活中被普及。欧文主义的普及不在于他的空想成分,而在于他的“说词”说出工人的共同经验,那是对新机器的仇恨。以机器为中介,欧文的思想促成了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这一阶级意识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不同职业和不同文化水平的工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由各种组织机构中显示出来;另一方面,工人阶级或“生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利益同其他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这一阶级意识的形成取决于中等阶级对工人阶级力量作出的反应(汤普森,2001,951)。

汤普森有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使用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强调了宗教、新中等阶级以及激进政治和工人劳作的经验对其阶级意识形成的作用,当工人阶级能够用其学到的价值观来理解和表达其共同经验,并将这些被压迫的经验指向机器等现代化的工具时,工人阶级就产生了。汤普森的分析重点是一种文化建构的理论,它将宗教、自由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工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情感体验相联系。正是工匠组织和文化传统形成了特定的工人对工业化的反应和阶级意识,工人们用激进政治的思想来理解自己的生活处境的

方式将他们自身上升为一个阶级。

斯格特对法国玻璃工人的历史考察,揭示出 19 世纪手工艺人和其行动的政治意义。斯格特认为,技术工人的斗争是为了控制他们的工作而进行的,其结果是展开了对雇主和对社会秩序的斗争。从玻璃工人的情形看,只要工人们能够对自己的工艺有控制能力,他们就毫不关心社会主义理论和其他工人阶级的斗争活动。只有当他们的技术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被贬值,他们才会产生阶级意识(Scott,1974)。这意味着当资本主义发展至将技术工人亦无产阶级化时,工人切身的经历是形成劳工政治一致性和觉悟的关键因素。

(二)文化变迁和政治话语催生的阶级意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劳工史研究完成了向话语研究的转型。琼·斯格特是个典型代表,她在 1987 年的研究表明,她迅速完成了从无产阶级化理论向话语分析的转型。她重新审视了自己以往的研究后指出,与 19 世纪上半叶技术工人的抗议不同,早期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对其无产阶级化的一种反应。她研究了成衣工人的语言,指出工人身分不是从资本主义对手工业的侵入中以简单、自然的方式产生的;成衣工人是依据当时的经济、性别和政治话语来认同自己的身分的,他们在对工作组织的理解中加入了家庭和性别的内容。斯格特的分析指出,解释性的经验(interpreted experience)是裁缝和缝纫工人集体认同的源泉(Scott, 1987)。

话语分析的主要代表人物斯维尔在《法国的工作和革命》一书中提出了劳工共同的语言的问题,挑战工人阶级形成理论中经济因素具有首要地位的假设。他发现,从工业社会工人出现开始到 19 世纪,劳工的宣言一直延用相同的语言。他并不否认工作条件的变化对阶级意识发展所起的作用,但他认为,阶级意识基本上是文化变迁的结果。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阶级意识的新意涵被不断创造出来。他指出,仅靠资料来说明工人生活的状况并理解阶级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够的,劳工史学家的任务是寻找和重建“那个时代,工人们思考自己工作和生活经验时所使用的言语、比喻以及修辞习惯”。斯维尔坚信,在阶级产生过程中,文化行动是超越于“真实”的经济力量之上的原动力(Sewell, 1980)。

法国学者瑞迪对 1750—1900 年法国的纺织工人进行的研究支持了斯维尔有关文化具有独立性的论断。他把市场看作是一种文化建构,用非传统的方法思考工作和收入对于纺织作坊中工人的意义。他认为,有关家庭、荣誉和独立性问题上的冲突更多的是团体冲突,而不是阶级冲突。因此阶级意识没

有被他纳入研究框架。他认为,自 19 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概念与工人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无关。在他看来,法国劳工史学者们长期以来相信的法国北部工厂几乎是马克思无产阶级的典型的想法是靠不住的(Reddy, 1984)。

英国劳工史学家琼斯在对宪章运动的研究中提出了有关政治与意识之间关系的问题,其研究带有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色彩。他认为,宪章运动是激进政治演讲的产物。他颠倒了有关“经济上的不满导致了工人阶级意识产生和宪章运动”的习惯认识,提出“并不是意识创生了政治,而是政治催生了意识。”(Gareth Stedman Jones, 1983)

对阶级意识的话语分析是将意识与表述的政治相联系,将建构与表述置于工人们阶级认同的中心地位。这一研究视角对本文的思考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新的融合:多元力量的融合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种综合的观点。布若威在《生产的政治》(1985)一书中,从不同社会的生产政体出发来建立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他将国家干预、工作现场的关系以及市场力量纳入分析范畴,认为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形成。由此解释工人如何不仅生产了物、关系和体验,同时也将他们自身生产成为一个阶级的行动者。(布若威, 2008, 第 17 页,代译序)

2001 年,在美国的韩国社会学家具海根教授发表了《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一书,他将无产阶级化理论、话语理论,以及国家、工作现场的关系、身分政治和市场力量等纳入到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分析中。

韩国的工业化与英法等国不同,它起飞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使用外向型、出口为导向的战略实现了工业化。其出口额从 1963 年的 8700 万美元,增加到 1970 年的 8.35 亿美元。制造业增长率大约为每年 19%。国民经济和人们谋生方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蓝领工资的工人数量迅速增长,从 1960 年的 130 万人,增加到 1970 年的 340 万人。迅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实现了无产阶级化。同时,政府鼓励的积累方式是随出口市场的发展快速向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转向,这种不断发现新的细分市场的积累模式,引导企业更快地动员外部资金进入市场。这样的积累模式无法建立一支稳定的劳动队伍。而工人是高度适应和流动取向的。这种状况取决于三种重要的劳动力背景:一是教育体系为工业化培养了一支服从权威、守时、军事化的工作时间和接受

经常性评价的劳动队伍；二是其军队股役制度，其独裁主义的特性为等级制的工业组织做好了准备；三是家庭制度是一种不断再生产出家长制的家庭结构，家长制的意识形态为工人在企业中诉诸家庭工价值的服从和忠诚奠定了基础。其中第三点是学者特别强调的，它为出口行业生产和再生产出合格的劳动大军。由此使韩国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进行得异常顺利（具海根 2004，57—60 页）。由此，韩国的工业权威呈现出独裁、家长制和专制的特征。工人长时间的加班劳动和低工资的普遍存在；造成了工人的高流动率。工人之所以能够忍受残酷的劳动条件的主要原因是家庭的贫困，强烈的家庭伦理被带到工厂中。另一方面，是社会传统中广泛存在着对体力劳动的轻视，导致了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区隔。对工人的专制控制并不限于其工作和工作时间，还涉及到控制个人空间和工人的身体。韩国的工业组织与军事组织之间存在着令人震惊的相似性。具海根先生认为，正是这种高度剥削性和滥用权威的工业生产制度，才最终导致了韩国工人的愤怒，为其后劳工的好战性提供了舞台。

具海根特别注意到了韩国特别的文化和语言。他指出，韩国工人像早期日本工人一样经常使用符合他们身分的语言，因为工人在社会中处于低下的地位，使韩国工人的情感既受到地位意识的影响也受到权利意识的影响。以教育为依据的地位压迫是韩国工人阶级体验的重要方面。在 70 年代早期，工人们并没有合适的术语定义其集体认同；是国家创造了构建产业工人正面形象的新语言。70 年代后期韩国由大学生发动的民众运动，为没有工人阶级传统的工人提供了重要的认同工具（具海根，2004）。

总结上述种种，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首先是经历了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同时，工人阶级在专制控制的工业组织中受到剥削；但最终是在由大学生参与的民众运动中获得了全新的政治动员，劳工斗争为韩国迎来一个不断民主化的政体。这样的分析将被压迫经验、工厂的专制体制以及话语的动员等诸多因素视作作用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基础。

三、对中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

转型期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已经纳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这有它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它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自我尝试，又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应对新生产模式的革命性变化的产物。但资本战略和国家战略一直同步进行，形成了特别的统治形式，而劳工队伍则显得沉寂。工人

们以打工者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被边缘化和污名化,我们几乎听不到工人们的声音。只有在21世纪珠三角的制造业工厂中普遍出现了“民工荒”的时候才使公众注意到这个群体无声且强有力的存在。

像许多研究学者指出的一样,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和阶级意识是复杂和多变的现象。阶级意识并不是以线性的方式提高,在任何时刻,工人阶级意识本身都常常是不一致的或充满矛盾的。(Mann, 1973, 46—47; Fantasia, 1988, 5—6)

回顾已有的对中国工人的研究时就会发现阶级分析成为了重要的视角。目前至少形成了三种理论分析:结构分析理论;结构型构理论;主体性理论。

第一,结构分析理论以西方社会分层理论为基础,分析工人阶级在社会整体中的位置。结构分析强调无论是劳动者还是资本所有者都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三十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劳动者因产权结构、城乡结构、技术结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等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分化,这些分化产生了重要的分析路径,至少有三种认识,首先是在20世纪80—90年代,揭示出劳工的“碎片化”状态。到90年代中后期,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于两种经济制度之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理论得到普遍认同,即在大市场内存在一个高级劳动力市场,由较高学历的人构成,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同时还有一个次级市场,工作不稳定且生存在不利的工作环境中(李强,2001)。到新世纪更多的学者关注分化的劳动力如何被重新整合或是否能够出现工人阶级的再形成,至少要在学术中完成两个转换,第一个转换是从“抽象工人”转换到“具体工人”,以分析工人在具体情境之下的实践逻辑。第二个转换是返回到生产中心性,关注生产过程对塑造农民工的决定性作用,以此寻找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沈原,2006)。对制度、工人行动与工人阶级的形成三个方面的整合分析表明,随着中国变成世界工厂,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形成问题被提到了日程。工人阶级形成有两种前景,第一,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内,为现存体制所容纳,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形成;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外,与现存体制对立,那么工人阶级难免会形成。决定工人行动导向的是社会体制能否对工人的诉求进行合理回应,能否在回应困难的时候对现存体制进行修改,以实现工人所期望的社会公平。鉴于目前体制的合理回应能力与动力不足,工人阶级的形成已经被启动(许叶萍、石秀印,2006)。

第二,结构型构(Structuration)理论。这一理论不讨论结构本身,而是重新理解社会群体的定义、界限和群体间的关系。李静君认为,不能假设过去社会结构遗留下来的群体单位和划分在今天一样有用,在改革开放的状况下,社会群体的(利益)意识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要对社

会过程进行详细观察和分析,阶级分析成为有意义的分析单位,而工人来源的分化和性别分化都具有意义。于是,中国劳工问题的理论化就成为阶级构成的问题,它与劳工身处的历史、结构和处境相关。阶级不仅是客观的产物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是一个历史过程,是群体间的(关系)(relation)。它涉及群体的争逐,在争逐的过程中,形成阶级间的分野及阶级内的聚合。所以,阶级是动态过程,而不是结构(Structure)。因此,她反对笼统地将不同收入的群体称为社会阶级阶层,也反对以收入、声望、教育、财产的差距来说明社群间关系的性质及分层机制的作法。李静君强调对工人阶级经验的分析,即分析由阶级带来的文化、体会、感受与思想、意识的混合,包括了劳工对市场制度的理解和接受,对改革的道德判断。他们所有的一套来自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的语言和思考工具,引发出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和接受,她认为,工人群体似乎按着他们在新旧体制之中的不同的处境而产生有差异的阶级经验。中国工人的阶级力量(class capacity)在市场发展快的地区较明显地弱化,但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在全国都明显地尖锐化。她认为,中国工人在市场改革下,正经历重新构成的过程。阶级意识在各地不断激烈化,阶级政治的范围在扩大,而模式亦多样化。劳工实际处于旧体制已消失,新体制未建立起来的裂缝中,大部分工人失去讨价还价的权力。在工人与国家的关系上,李静君认为,政府更改了对工厂的直接控制,而是通过在外部、宏观的调节(regulate)以实现社会秩序。社会政策对劳工政治的影响十分重要,例如近年涌现的有关失业,再就业、下岗救济、最低工资,最低生活费、劳动争议法规等。在界定不同工人的就业待遇的同时,亦把工人划分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引导劳动争议规范化的同时扩大了争议的范围及议程,将车间政治外化(李静君,2006)。李静君通过对南中国外资工厂中较复杂的劳资互动关系的研究指出,并不是中国政府容忍外资剥削中国工人,而是厂内的劳动控制战略很大程度受劳动市场的组织运作及劳工从厂外引入厂内的群体特征所影响。乡里网络及这些网络内的性别权威关系,被厂家移植至厂内作为管理手段,而劳资的阶级关系又与女工的性别利益和身分认同互相扣连,剥削同时带来反抗和赋权的可能(Lee,1997)。从结构型构的分析是将阶级视为关系性的,并在关系中考察阶级的存在。

第三,话语和工人主体性。潘毅注意到官方话语的对农民工的刻意回避、大众媒体对农民工的负面报道、城市原住居民的对农民工的排斥等共同塑造的农民工群体低能低素质的形象,以及这一形象与农民工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对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作出的贡献的反差,而这突出了农民工和学界的“失语”。她称对工人人们的“沉默”是打工阶级的“失语症”(discursive dyslexia),这种失